

感悟 中国智慧

2013·孔学堂精品演讲录

本书集中国内诸多大家，讲座所涉包括国学与生活、传统经典解读、传统与现
代等方面的内容，均以传播、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为宗旨，内容通俗，讲解生活
化，是大师们努力传统文化进入广大民
众生活的经典尝试。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義塾

中國圖書分類法

100

感悟

中国智慧

2013·孔学堂精品演讲录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中国智慧：2013·孔学堂精品演讲录/贵阳孔学堂管
委会主编.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21-12144-8

I. ①感… II. ①贵… III. ①中华文化—通俗读
物 IV. ①K2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5369号

感悟中国智慧

——2013·孔学堂精品演讲录

主 编：贵阳孔学堂管委会

责任编辑：沈晓枫 史开杰

封面设计：熊 锋

装帧设计：陈红昌 余妍茹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550004)

印 刷：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印制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6.25

字 数：460千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1-12144-8 定价：42.00元

此书受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出版专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本书编委会

主 编：蒋星恒

副 主 编：侯 楠 周 琼

编 辑：杨雅捷

审 稿：马希顺

录音整理：龙光斌

校 对：龙光斌 石 静

目 录

王 蒙：中华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观念	1
杜维明：“仁学”的全球涵义	16
于 丹：感悟中国智慧	39
纪宝成：儒学生态论坛主席致辞	64
杜维明：破坏生态就是慢性自杀	67
张立文：儒家和合生态	73
郭齐勇：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综论	88
郭齐家：礼的历史发展、功能、现代价值	122
吴 光：王阳明的事功、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131
杨天石：蒋介石与宋明理学	146
钱耕森：“中庸、中和、诚”的生态智慧新探	155
顾 久：人的自觉与孔子的思想	166
金正昆：人际交往和有效沟通	184

姚有志：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战略影响	193
李宽定：礼制与法制	210
黄朴民：兵儒异同与思想融会	223
朱伟华：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现代阐释	248
吴根友：依道而“看”与人的能在	260
吴如嵩：孙子兵法的战略智慧	272
肖克凡：漫谈当代文学创作	282
黄开国：先秦的公羊学	294
杨天宏：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影响	325
刘援朝：读书三要诀—勤学、勤思、善思	349
张亚辉：康熙的《圣谕广训》和《七询》	360
陈文新：仁义、隐逸和女性	385
宋一霖：儒家之道及其复兴意义	403

◎ 王 蒙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2010年11月15日，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各界关注焦点。为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华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观念

（2013年6月26日，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谈谈中华民族文化对治国理政的看法。按过去的说法，就是对“修齐治平”的看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们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教训，也有不少失败的东西，但毕竟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形成了这么一套政治文化，而这一套政治理念，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我想从八个说法讲起，不限于引经据典，更注意的是被人民所接受的说法。

一、世界大同

第一个说法，是“世界大同”。“世界大同”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有提到，它表达了最早的中国梦，中国文化之梦。《礼记·礼运篇》说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体现了中国人对“修齐治平”的最高理想——“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昨晚报道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里又提到了“天下为公”这个说法，而这也是孙中山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孙中山先生到处的题字都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可以说是我们自古以来很坚持的一个观念。我个人认为，“天下为公”启发了我们：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传统文化的依据，中华传统文化的治国理政观念这个依据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还有个非常中国式的提法，就是“性恶论”还是“性善论”。在中国，比较占上风的是“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在西方，讲人的原罪，很多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方法都是按“性恶论”来设计的。然而，在西方的各种思潮里头，恰恰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与“性善论”比较接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性恶”的那些东西，那些自私、那些贪婪、那些恶性的竞争都是因为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如果取消了私有财产，人应该就能变得“大公无私”，就能显示出最美好的一面了。这也合乎中国的“性善论”，也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依据。我想我们都应该记住中国人脑子里“世界大同”的这样一个中国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

二、以德治国

第二个说法，也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以德治国”。权力本来应该是一个武化的东西，而在《论语》中，却将权力道德化、文化化。什么叫权力？权力就是：我可以动用一些手段来对你进行管制，对一些事情做出规划和控制，而对不服从我权力的人，我有办法对你进行制裁。这个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国家？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当然，那讲的是阶级社会的国家。马克思讲，国家是由什么来组成的？是由军队、法院、警察等，所以我说权力本身就是武化的。但是，中国的先贤们更注意的是权力的文化化。就是说，权力不仅仅是以力服人，更要以理服人。中国的许多先贤们都认为越古代的皇帝越好、越是以理服人，譬如伏羲氏、有巢氏、神农氏都是最好的皇帝。到了孔子那里，他还认为周公最好。

庄子的理论就更严格一点，他认为好就好到神农氏那儿，到了黄帝轩辕氏那儿开始，用的就是武化的权力了。轩辕黄帝是靠打败蚩尤，靠战争的胜利才建立了当时的政权，所以庄子对黄帝不满意，有微词。但是庄子喜欢神农，当然这又是很专业的问题。神农究竟是不是炎帝？如果是，那就是最好的，为什么好呢？因为他不仅仅管制国家、管制子民，他还教大家种地，教大家制造各种农业工具，成为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奠基人；他尝百草，确定各种草的实用性或者药用性，那就是说他还是中国医药学奠基人。不过，对神农的这些说法都带有传说性质，他不像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我们至今找不到神农氏的著作。那么，神农究竟是一个人还是好几代人都叫神农？在现代学术里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对这些也知之甚少，但他塑造的这个形象非常可爱，他让我们知道，领导人是什么？他要化育人民，他的德行要高、道德要高、本事也要大，因为“德”在古代既有道德的含义、品质的含义，又有功能的含义。神农的可爱之处不仅在于农业文明，传说神农好像还发明了或者开始制造了乐器，神农还属于音乐家，中国的音乐祖师。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人，他用自己的德行来化育人民，建立了人口众多、不断繁衍、拥有自身文化的这么一个种群——民族。

这里就包含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大一统，虽然中间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分裂，但中国人喜欢的不是分裂，而是统一。中国这个地域拥有传统的“中原文化”，因为我们不面临和别文化共存或者平起平坐的挑战，它东边是大海，北边、西边、南边有一些相对生产、生活、文明程度都比较低的少数民族，所以自古我们就认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是统一的，因此我们不得了，我们非常大。首先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①，在哈佛大学成立了一个中心，叫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江泽民主席第一次正式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就是在费正清中心。费正清先生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中国有一套很特殊的延续几千年的治国理政方法，在全国进行集中的管理和统治，这个叫“集权”。“集权”本身不带有任何的贬义，它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如集中管理、分散管理等，它是和“分权”相对的一个概念。“集权”与另一个“极权”的含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极权”带有贬义，它指专制、独裁、压制人民，压制不同的见解等等，而中国长

^① 费正清(1907—1991)，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被誉为“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期是属于“集权”。费正清先生的这一观点被基辛格^①所接受。大概在前年吧，胡锦涛主席到美国进行访问之前，基辛格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里面就讲到了中国有自己几千年的一套治国理念和治国方法，如果想让别的国家教中国怎样治国理政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中国，这个集中统一的领导者，怎么给他一个合法性？为什么他就能够领导一个国家呢？我认为，在中国的说法是两部曲：第一部叫“天意”。天意这东西是无法验证的，皇帝就是天子，皇上出生的时候不是龙降到他身上就是房上冒着红光，证明是天意。第二部叫“厚德”。一个人身上怎么能表现出来是天意呢？就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了和天地一样伟大的道德，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你的身上既有自强不息的优点，又有厚德载了天和地的最美好的品质，你的统治就“合法”了，这就是“文化合法论”。虽然对“文化合法论”一直存在着疑惑，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很多学者通过考察，认为历代君主和皇帝从道德上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也存在有很多问题，比如唐玄宗把他儿媳妇讨来当老婆，你就不能说他道德上非常好。还有儿子杀了爸爸的，叔叔杀了侄子的，杀老婆那更是常事儿了，因此很多人认为从道德上并不完全能说明这个问题。还有些学者提出：几千年来中国的皇帝中既做到了以德治国、施行仁政，又做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只有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文景之治”。但是，即使有这样一些质疑，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中国人民愿意接受“以德治国”这个提法，愿意接受“天下为有德者居之”这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让人民感到精神比较舒服。古代臣子亦是如此，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以德治国”的“天子”的统治和指挥是合法的，说什么算什么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文化监督”。在客观上，“以德治国”形成了对权力系统的文化监督与道德监督，尽管也有一些不理想的事情发生，但皇帝其实在舆论、文化、道德、举止上也是有很大压力的。近年来境内、境外出版了一些讲中国政治、讲中国皇帝、皇权的书，比如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书里看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皇帝其实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很多皇帝想干的事根本干不下去，满朝的文武大臣要根据道德的原则、根据

① 基辛格，全名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文化的原则来筛选皇帝的各种指示，有些我立马给你办，有些我给你放一边挂空了，有些指示我变相地不给你执行。比如海瑞^①当时见皇帝，写的文书跟破口大骂一样，把明世宗气得当时立马下令要处死他，可周围几个大臣都说海瑞这个人是专干这个的，他来以前棺材都订好了，您现在要把他一杀，他就成了名垂青史的大忠臣，你就成了暴君。到最后，明世宗憋气憋了好几天，也只能说：你提的这些意见对我帮助很大。因此，“文化监督”虽然不是特别管用，但有总比没有强。

第三点，这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中国自古以来不能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有很多“民主”的程序，但却因为有了“以德治国”的说法，至少使得一些臣子有可能给皇帝提意见，甚至提很尖锐的意见。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当一个文官，就要敢于为坚持真理，不惜死在皇帝手里。在中国，我们可以说这是封建专制，因为它的确也存在这一面。然而，也正因为有了“以德治国”这样的说法，就给农民起义找到了根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权力系统缺德太甚、失德太甚、悖德太过的时候，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发生颠覆政权，权力系统就会被指责为无道昏君，而你只要带上了无道昏君这个帽子，你就快完了。所以说，中国这一套“以德治国”的说法，仍然有它积极的意义，虽然并不可能完全做到。

就“以德治国”这点来说，中国和外国区别非常大。比如前段时间被判刑的意大利前总理，他说话的语气在中国人看来就和小流氓一样，中国就是最坏的干部也不会那样说话。俄罗斯那个叫日里诺夫斯基^②的民主主义政党，他讲话更是可怕，还用酒换选票。中国到现在提拔干部还是强调德才兼备，而且是以德为先，这个很有意思。记得在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来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那一年里头各种文件都有这个词，但后来几年，就没人提了，直到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里又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可提完后最近又没人提了，我都有点着急了呢。毕竟，我认为“以德治国”现在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活在党中央，只是调子不是特别高。但是，“以德治国”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如果我

① 海瑞（1515—1587），字汝贤，号刚峰，汉族，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明朝著名清官。历任知县、州判官、尚书丞。

② 日里诺夫斯基：全名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政治家，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创始人、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俄国政坛上最大的怪杰。

们认为用《三字经》《百家姓》和《弟子规》就能够治国平天下，那是做梦，那不是中国梦，而是傻梦、是封建梦、是旧梦。原因很简单，大家看看红楼梦就知道了，红楼梦也有梦，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没有搞过五四运动，但里面的人也没有几个人真正把道德、文化、礼仪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并不是共产党闹什么革命才把这些传统的东西闹坏了、闹乱了。如果在今天只知道“以德治国”，甚至误以为《三字经》说得多好，《弟子规》讲得多棒，全体一念咱们国家就办好了，这就是最愚蠢的想法，就是“自绝于现代化”，就是甘心让中国处于一个封闭、落后、停滞的状态，这就是邓小平说的闭关锁国的结果，就是愚昧无知。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干脆不理睬，或者不重视“以德优先、以德治国、有德者居之”，就等于“自绝于中国传统文化”，等于“自绝于人民”，毕竟人们喜欢传统，人们信传统。如果用一个人的先进事迹来证明这个干部很有道德，老百姓立刻就对这个干部印象非常好了。一个小例子，“文革”结束以后我先来到北京，在北京市文联有一个作家，“文革”当中比较活跃，有很多人攻击他，可是北京市文联所有的勤杂工都说这个人的好话，为什么说他好话？因为他老婆比他大四岁，是文盲，而且很爱发脾气，拍桌子打板凳的，但这个著名作家对他老婆仍然是非常之好，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么好一个人，你们居然还挑他毛病，全文联的作家哪一个能比得上他。所以我们不能自绝于人民，不能自绝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我认为，对这个“以德治国”，大家还要好好研究一下，好好弘扬一下，当然也必须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三、中庸之道

中国人所讲的道德和西方人所讲的道德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譬如说西方是很讲究竞争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中国的先贤诸子对竞争的态度都比较保留，主张不争，因为争了以后会变成暴力之争，中国人更讲究的是人情味，讲究的是人际关系，讲究的是适可而止。特别是“中庸”这个词，曾经在中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我们将“中庸”放到政治上，看成是一个人的政治道德。而在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念里，它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多元制衡”。所谓“多元制衡”，就是将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界别等等

的利益和诉求达到某种平衡的状态。一个总统，他做到没做到，是另外的事，是好是坏我们不多做讨论，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他是“多元制衡”的。有一本书叫《总统是靠不住的》，正因为总统靠不住，所以要将他的权力分割成几面，互相克制。但是中国没有多元制衡的传统。在中国你随随便便实行多元制衡，有可能把国家搞分裂，有可能出乱子。那么，中国有没有一种平衡呢？也有。中国的平衡往往不是表现在同一代领导人的时期中不同力量的互相制约，而体现在时间纵轴上的平衡，不是空间横轴上的平衡。什么意思？一句话概括，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很有趣，水文学家研究过，哪一路的河流改变河道都是以三十年为周期的，西方也把三十年认为是一代。因此我们说用几代人的时间，没有人详细定义过几代人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但是西方有，一代就是指三十年。过了一代人就会变了。所以做人啊，什么事情做得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做得太过，要留有余地，因为你不但有“河东”的时候，也有“河西”的时候。林语堂^①说：中国的文化喜欢的是少年老成的时候，喜欢的是老成持重的人，喜欢的是不慌不忙的人，中国人不喜欢那种特别往上冒的人。中国还有个说法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时听了都觉得可怕，说“十年树木”还挺好理解，一个树苗子栽在地上，十年就比较靠得住了，但是这个“百年树人”我听着就可怕了，你如果要培养我需要一百年，你得把我培养到哪儿去了呀？培养成功了我也没有意义了啊。当然，这是句玩笑话，“百年树人”的意义可以解释成，如果我要做教育人的事业并且让它见到效果，我得做一百年，我的培养未必立刻有效果，然后我接着还得培养你儿子，我如果死了，让我儿子培养你儿子，让我孙子再培养你孙子，到时候就有效果了。用巴尔扎克的话，就是培养一个贵族，至少得三代人，为什么呢？就是把你送上了贵族学校，可是你爸爸妈妈都是黑社会，那么你一回家得受到影响，所以需要“百年树人”。记得五六、五七年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我列席了中国作家理事会的扩大会议，这是一个批评丁玲^②同志的会议。到丁玲同志发言的时候，她说：

① 林语堂（1895—1976），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②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品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给我说，看一个人，光看几年是不够的，要看得看几十年。”我当时听着也挺紧张，因为你说看人看几年吧，这还好说，你要再看几十年不把我看成老头儿了呀。我现在发现，看一个人至少要看三十二年，为什么呢？前三十年“河西”的时候他表现得不错，第三十一年“河东”的时候他迎合时尚、跟着潮流走，把你给卖了，你说那样的人你能信他吗？所以三十年后我们还要再等上两年。中国讲这个“中庸之道”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庸”这个词在后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被糟践得很厉害，其实主张“中庸之道”不仅仅是中国人，学者们说，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人，他们都主张“中庸”，但他们说的那个“中”就是中点，而中国学者有的又分析说“中庸”的“中”指的不是中点，而是准确、是“重”、是“郑重”。“庸”字现在也变成一个坏词，是平庸、庸俗、凡庸。但“庸”其实就是正常的意思，就是你不发神经，你正正常常。有很多事你正常的、合乎常识的反倒是正确的，稀奇古怪的说法，反倒是不正确的。因此，关于“中庸之道”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观念上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表达中华文化，我们还很喜欢用汉字组合成一些很美好的词，比如说“仁、义、礼、智、信”。前几年政协有一位委员给李长春同志写过很长的信，就是主张要提倡“仁、义、礼、智、信”，长春同志也有批示；还有就是“礼、义、廉、耻”，这叫“四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还有将“礼、义、廉、耻”再加上“孝、悌、忠、信”，叫做“八纲”；国民党有个总结，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国民党的少年儿童组织，叫童子军（我们的叫少年先锋队），童子军也有三个字，叫“智、仁、勇”；在京剧上喜欢说“忠、孝、节、义”；现在在老百姓当中最喜欢的，一个是“忠厚”，一个是“仁义”，尤其是仁义、义气，从这个“忠厚仁义”的说法里头，我们也体会到一点“中庸”的味道。这些词语都和中国文化有关系，都表达了比较老旧时候中国文化中所追求的人应该有的品质。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但有人说，现在的西方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不行，我们不光是载舟覆舟，人民是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他是有他公民的权利的，是有他民主的权利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表明了中国

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社会里头，人们还是有一种“民本”思想，觉得人民很厉害，人民要拥护你，你简直威风得不得了，你是金口玉言，你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如果人民要是反对你了，人民要折腾你了，人民要推翻你了，你就变成了毛泽东说的“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当然，一般的连可怜虫也当不成，脑袋都掉了，“向隅而泣”也做不到了。因此，中国人早早地就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中国皇帝非常厉害，电视剧里头也总是有意无意地迎合着大家心目中的那种“至高无上”“皇帝真威风”的思想。但是我们的电视里头太缺少描写当一个皇帝被农民起义追得东逃西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那种惨状。中国（古代中国）既是一个权力极其集中的社会，又是一个用暴力手段，通过农民起义来更迭朝代、更迭权力属于谁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这里边的经验教训太多了。一个是怎么“治国”，我们要研究，同时还要研究怎么“乱国”。东周怎么乱的、秦朝怎么乱的、西汉怎么乱的？这里边学问太大了。这里我提一点，中国的文化思想，它有些很有趣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我们都非常讲服从，讲孝顺、愚忠。但是，中国的民本思想里头，也有它暴力的一面，也有反叛的一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造反有理”的这一面。比如说，老子在《道德经》上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他说这个“天”，什么是“天道”？“天道”就好像拉弓射箭，你左手高了，左手就向下压一点，你右手高了，右手就压一点，拉弓的时候你的四个手指头都要使上劲，否则不匀，箭射出去的方向就不对了，劲大的地方小些，求得一个平衡，求得一个准确。“天道”是什么呢？强者帮助弱者和弱势群体，这才叫“天道”。老子下面一句话太厉害了，叫“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说人之道恰恰相反，谁强谁就从弱者身上刮油水，谁就压榨弱者，谁就剥削弱者，他要损害弱势群体，来锦上添花给强势群体。老子这话说得太凶，太可怕，这是社会革命党的语言，就是说你这个人很贫穷了，就是你越穷，你越碰上些吃亏的事，最后那已经很富的人他就更富。贫富悬殊、贫富分化，越倒霉的人就越抬不起头来。这话是很可怕的，是含着某种反叛性的。《道德经》里还有其他地方含有反叛性，说为什么有的人吃不饱，就因为诸侯吃得忒好、吃得忒饱。所以，自古以来农民起义者他们打出来的旗号都是四个字——“替天行道”，一旦到了一群一群的农民